



雅克·拉康

JACQUES LACAN 阅读你的症状 上
Read Your Symptoms 吴琼 著



雅克·拉康

JACQUES LACAN 阅读你的症状 上
Read Your Symptoms 吴琼 著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 北京 ·

总序

时光已悄然走到了 21 世纪的第二个十年。哲学这门古老的思想技艺在蜿蜒曲折的历史长河中屡经淘漉，在主题、方法和形态上不断发生着深刻的变化；然而，在自身中对自由精神的追求，在思想中对智慧境界的探寻，在反思中对历史与现实的把握，却是她一以贯之、经久不衰的品格。正是这些品格，使每个时代杰出的哲学思想成为时代精神的精华。

我们正处在风云际会的全球化时代，纷繁复杂的时代变迁既为理智生活提供了足够丰富的思想材料，也向哲学提出了极其严峻的挑战：如何描述我们的生活世界？如何刻画我们实际的生存境域？如何让驰骋于外物的内心生活重新赢得自足的根基？如何穿越各种技术统治的壁垒，实现自由而全面的发展？

我们也站在古今中西的十字路口，源流各异却又殊途同归的各种思想资源既为哲学提供了丰富的滋养，也让哲学面对数不清的艰难抉择：如果哲学真的是带着乡愁寻找家园的冲动，那么梦想中的家园是在古老的期盼中，还是在今日的创造中？既然以往的哲学已经提供了形形色色的安身立命和改造世界的指南，确立了各个层面的观念批判和社会批判的原则，当今的哲学又如何在继承、革新和创造中描画自身的范式？

这些问题，这些挑战，已然引发了多种多样的回应。这些回应方式接续着哲学长河中的伟大传统，举其卓有成效者，或以经典文本为研究对象，与哲学大师晤对，与时代问题对接；或直面哲学问题，以锐利才思洞幽烛微，以当代立场梳理剖析；或在反思中考问现实哲学问题，举

凡伦理人生谜题、宗教信仰困境、科技生态难题，皆以哲思相发明，力求化危机为契机。

在回应这些挑战的学者中，既有涵泳覃思的学界耆宿，也有意气风发的中青年才俊。以新一代中青年学者之佼佼者而言，视野开阔而不故步自封，沉着稳健而能破门户之见，多能将本土资源与异域资源相贯通，将才气与襟怀相融会，管窥锥指，亦能以小见大，旧瓶装新酒，未必不能化腐朽为神奇。

为了让这些当代的回应更充分地发出自己的声音，展示当代学者特别是中青年学者的研究成果，哲学文库编委会与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合作，遴选佳作，荟萃英华，推出“哲学文库”系列研究丛书，以期回应哲学应当直面的各种挑战，应当反思的各种难题，力图敞开更广泛的理论视域，力求奠定更深厚的思想地基。假以时日，集腋成裘，汇成系列，对当代中国的哲学研究当大有裨益，亦能于国际学界赢得一席之地。

是所望焉。谨序。

哲学文库编委会

2010年1月1日

如何阅读拉康？——代序

拉康或者说拉康的“作品”可以拿来阅读吗？如果把这个问题抛给拉康本人，他一定会断然地告诉你：“不可以，如果你真的想要理解我的东西，那就去听我的研讨班吧，在那里，即便你依然做不到真正意义上的充分理解，但通过现场，你所获得的将是任何阅读都无法给予的。”

是的，拉康是不可阅读的，因为他的作品绝大部分是在课堂上或讲台上宣讲出来的，而不是专为“阅读”而写作的。以德里达主义的角度说，拉康似乎属于那种重声音而轻文字的在场形而上学的传统，可实际上，他并没有把声音和意义的在场相等同，相反，作为一个精神分析学家，他把“声音”看作是其本身不表征任何意义的语言“废料”。拉康把课堂和讲台视作是分析设置的一个组成部分，主张分析实践作为一种症状“阅读”活动只存在于倾听和阐释中，而这种倾听和阐释又只能借助于言语、只能在言谈情境中来实现分析的“逐步突破”，这就是说，对他的思想或“声音”的“阅读”和“理解”根本上离不开主体间性的结构，离不开横亘在主体之间的言语场域的作用。

拉康的不可阅读还在于他是一个具有超现实主义风格的理论家，是一个处处将论说掩藏在巴洛克式的修辞中的演说家，是一个喜欢逻辑跳接和语义滑动、喜欢对他人的概念做劫掠式挪用、喜欢运用连专业的数学家都看不懂的拓扑变换、喜欢装备许多“科学化”的伪形作为理论盔甲的“知识恐怖主义者”。

拉康是不可阅读的，可另一方面，正是这种不可阅读性，使得他成

为了罗兰·巴尔特意义上的那种“可写的”作家，几十年来，人们从各个不同的学科领域和各种不同的角度阅读、阐释他的理论，但直到今天，我们仍没有看到有哪一位阐释者敢说他/她的阐释是完备的，至于哪一种阐释才是合法的或正确的，我想这个问题可能永远都不会有最终的结论，甚至说，如果有哪位阐释者敢说只有自己的阐释是唯一正确的，那他/她一定属于拉康所说的那种“愚蠢的主体”，一个早已为幻象所捕获却又全然不知的主体。

拉康是不可阅读的，这恰是我们“必须”阅读拉康的理由，也是我们阅读拉康时必须信守的边界，是使我们的阅读得以可能的一个前提——按照拉康的逻辑，只有在不可能性中，才有可能开出一条可能性的道路。其人已去，现场的倾听已不再可能，阅读——包括听现场录音，那不过是另一种形式的“阅读”，因为你听到的将不过是作为“剩余”的声音，以拉康自己的话说，那不过是一堆有待处理的“废料”——便成为我们再次走向他的唯一路径。于是，我们必定要面临一个令人焦灼的问题：“如何阅读拉康？”

是的，这同样是一个愚蠢的主体才会提出的问题，因为它已然隐含了对某个“正确”读法的渴望。不过，如同拉康自己把所有的“阅读”皆视作主体对自身症状的“阅读”，而症状“阅读”是一个逐步突破而非逐级还原的过程一样，对拉康或者说拉康文本的阅读亦当在这一症状阅读的层面进行，换句话说，面对“如何阅读拉康”这个问题，要想自己不至于因为“正确读法”的诱惑而被引入意义的封闭，就需要对问题本身做一方向性的置换，即把“如何阅读拉康”置换为“如何通过阅读拉康来阅读我们自己的症状”，以及如何有效地突破拉康在文本中刻意设置的重重障碍，在他伏击阅读主体的地方找到进入症状结构的入口？

—

不妨先看一下西方世界已然发生的对拉康的阅读。

有人称拉康研究已经成为一个“产业”，这一不无讥讽的描述的确道出了部分的真实，至少在英语世界，我们看到，拉康研究确实已成为

一个庞大的学术作业，专著、期刊、特刊、丛书、论文集、学位论文、会议论文、专业网站等等，从 20 世纪 70 年代至今，已形成一支浩浩荡荡的产业大军，且发展势头在进入新千年以后不降反升。

面对这个庞大而且庞杂的研究队伍，通观一下已有的研究成果，就会发现，不仅大家对拉康的理论结构和思想体系的描述纷繁杂陈，即便是针对同一个论题甚或同一个概念，大家的阐释也是各执一词，就好像各自谈论的是完全不同的东西。为什么会这样呢？原因当然有很多：比如，从拉康自己的方面说，其文本刻意的艰涩和模糊风格，其理论阐发技术的曲折回转，其对自己已有观点的不断“返回”和修正，这些都是引发歧义的关键；再比如，从研究者的角度说，不同的学科背景、不同的研究目标、不同的阐释方向等等，使得拉康的文本成为了一个欲望纽结点，一个既会聚欲望又生产欲望的机器，对拉康的阅读成为每个人阅读和阐释自身欲望及其症状的一种分析行为。

在西方，投身于拉康研究的主要有这样一些人：精神分析学家、心理学家、精神病学家、哲学家、批评家、文化研究者，乃至于法学家、政治学家、教育学家、宗教学家等等——当然有许多研究者（比如汉语世界比较熟悉的斯拉沃热·齐泽克）的身份是跨界的。如此复杂的身份构成使得人们在研究路向上常常呈现出一系列的差异甚至对立，比如我们首先在拉康派与非拉康派之间、临床实践者与非临床的研究者之间就会看到运作方向的不同；而在临床实践者当中又有精神分析学家、心理学家以及精神病学家之间的差异，在非临床的研究者当中也有哲学家、批评家、文化和社会科学研究者之间的差异。这一系列的差异——它们当然不只是涉及知识结构的问题，而是还关联到不同学科或领域的“求真”意志的问题——不仅导致了阅读的多样性，有时甚至构成了学术话语之间的沟通障碍，以至于即使面对同一个概念、同一段文本或同一个论题，持有不同话语模式的阐释者或研究者会得出大相径庭的解释。

举一个例子。拉康在讨论转喻和隐喻的时候曾在不同场合说到两者的关系：在一个地方，他说，转喻是使隐喻得以可能的前提，而在另一个地方，他又说，转喻对于意义的构成虽然是必要的，但却是不充分的。单单从理论的层面说，拉康这里的意思大约是：就转喻是为意义生

产提供一个意指语境，而隐喻是产生意指效果的机制而言，转喻是使隐喻得以可能的前提，是意义呈现的必要条件，而隐喻是使意义得以呈现的充分条件，并且是既充分又必要的条件。但是，当研究者把拉康的这一看似清晰明确的论断置于不同的语境——比如语言学、诗学或修辞学以及精神分析学的语境——来理解的时候，就得出了各种各样的意义解读。

比如解构主义者让-卢克·南希（Jean-Luc Nancy）和菲利普·拉科-拉巴特（Philippe Lacoue-Labarthe）在《字符篇：对拉康的一种阅读》（1973年）^①一书中——该书专一地对拉康讨论转喻和隐喻的著名论文《自弗洛伊德以来字符在无意识或理性中的代理作用》（下文简称《字符的代理作用》，个别地方仍用全称）（1957年）做了详尽的批判性阅读——强调了隐喻之于拉康的“能指的科学”的主导性。在他们看来，《字符的代理作用》这一文本整个地就是拉康的“符号学”，而拉康的“符号”又是抹除了所指的符号，亦即他的“符号学”是一种能指的科学，该科学的目标整个地就是“能指的逻辑”^②，转喻和隐喻则是对这一逻辑的说明。进而，他们认为，拉康对能指逻辑的阐述整个地就是对“隐喻”的阐述，因为他强调无意识的意义只有“在隐喻中”且通过“认同于隐喻”^③才能获得。具体到转喻和隐喻的关系，两位作者指出，拉康强调隐喻之于转喻的优先性、主导性，这表明他的思想包含了一种“意指秩序的内在目的论”^④，就是说，拉康最终还是没能逃脱德里达所批判的那种“在场形而上学”的陷阱。可是，这两位作者在批判中忘了最为根本的一点：拉康虽然强调隐喻在意义生产方面相对于转喻的优先性，可他也强调在隐喻中产生的并非确定的意义本身，而只是意义的诗意的火花；并且，虽然拉康承认能指的结构是先行刻写在意指秩序中的，可他同时又强调，能指本身并无所谓的意义，能指的意义只存在于一个能指对另一个能指的差异性的间

^① Jean-Luc Nancy and Philippe Lacoue-Labarthe, *The Title of the Letter: A Reading of Lacan*, trans. François Raffoul and David Pettigrew, Alba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1992.

^② Ibid., p. 14.

^③ Ibid., p. 13.

^④ Ibid., p. 75.

隙中，其对于主体而言是偶然的，是通过能指链的回溯运动被缝合到主体之中的，所以根本就不存在最终的确定的意义。解构主义者在拉康的隐喻逻辑中指认出来的那种在场形而上学其实是一种典型的理论误认或“误读”。

与南希和拉科-拉巴特的观点针锋相对，德国哲学家和精神分析理论家萨缪尔·韦伯（Samuel Weber）在《回到弗洛伊德：雅克·拉康对精神分析学的错位》（1990年）^①一书中指出，在拉康那里，转喻和隐喻乃是“能指的统一运动的两种功能”，就是说，能指只有在它们的“同步联系”中且通过这种联系来发挥作用，但另一方面，虽说这两者对于能指的运作是“必要的和相互依赖的”，可它们的地位并不相同：“能指只有借助一种同步联系才成其为能指，而这似乎也暗示了转喻之于隐喻的某种优先性。意义（亦即某一确定的所指）的效果要以链条中能指的运作作为先决条件。”^② 韦伯得出这样的观点，是基于他对梦的移置和凝缩机制的考察，就是说，他是通过“回到弗洛伊德”来理解拉康的能指运作机制。是的，拉康的确把能指的转喻性运作视作是意义效果产生的条件，可他明确地讲到那只是一个“必要”条件，隐喻才是意义产生的充分条件，以逻辑的角度论之，必要条件充其量只具有“时间上”的优先性，充分条件则代表着“逻辑上”的优先性。韦伯的阅读恰恰遗漏了“时间上在先”和“逻辑上在先”的这一区分。再者，韦伯的“误解”还在于他把拉康的能指链概念只理解为能指的历时运动，这样，确定的意义或所指的获得当然要以转喻作为先决条件，可问题在于，拉康的能指链并非线性的能指链接，而是一个拓扑式的结构，是能指在历时和共时层面的共同运作，脱离这个语境去谈论所谓的意义生产是没有价值的。

还有女性主义批评家简·盖洛普（Jane Gallop），她在《阅读拉康》（1985年）^③一书中把隐喻和转喻当作两种阐释类型：“隐喻性的阐释在于提供另一个能指来取代文本中的能指（a意味着b，其联系代表了菲

^① Samuel Weber, *Return to Freud: Jacques Lacan's Dislocation of Psychoanalysis*, trans. Michael Levin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1.

^② Ibid., pp. 66–67.

^③ Jane Gallop, *Reading Lacan*, Ithaca and London: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85.

勒斯)，转喻性的阐释则是为联想提供一个总体的语境。这一转喻性的阐释也许可称作女性化的阅读。”^① 基于这样一种理解，她挪用南希和拉科-拉巴特的观点，称拉康强调隐喻对转喻的优先性是一种“菲勒斯中心主义”，并以其女性主义的怨恨腔调说，拉康“对隐喻和垂直性的偏爱是一种‘幻觉’，且会使我们全都沦落为它的‘牺牲品’”^②。盖洛普的阅读的关键在于转喻和隐喻作为两种“阐释”类型：女性化的阐释总是转喻性的，因为女性代表着菲勒斯的根本缺席，亦即意义的根本缺失，故而其欲望的阐释离不开能指的转喻性链条；相比之下，男性作为菲勒斯的拥有者，其欲望可通过认同于某一象征的菲勒斯而使能指链的意义暂时得以凝定，故而其欲望的阐释是隐喻性的。这一女性主义的阅读的确颇具创意，但盖洛普急切地投向解构主义的怀抱使得她丧失了深入拉康性别理论的腹地的机会，至为根本的一点在于，拉康所谓的“男性”和“女性”指的是任一主体在意指结构中的位置，这个位置的获得与生理意义上的性别并无必然关联。

以上列举的远不是全部，但这三个例子已足以让我们领略到不同话语背景下人们对拉康的读解的多样化。当然，读解的多样化并不是什么坏事，它至少向我们提示了两点：第一，并不存在一个大写的“拉康理论”(Lacanian Theory)，而只存在各种小写的“lacanism”或“anti-lacanism”，包括拉康本人也有着多个版本的“拉康主义”，而他在晚期还声称自己是“反”拉康主义的；第二，所有对拉康的阅读都可能是转喻性的或隐喻性的，但关键在于，我们需要明确自己的话语构型，需要知道自己与拉康的对话是有语境参照的；同时还要明确一点，即我们在阅读中有意或无意地设定的语境只是相对的、暂时的和有限的，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如同本书的标题所暗示的，任何对拉康的阅读首先都是对我们自己的症状的阅读，并是从阅读我们自己的症状开始的。

当然，不同的专业背景只是影响阅读方向的一个因素，换句话说，阅读方式的差异实际是多元决定的结果。而许多时候，人们在组织和阐释拉康理论的过程中对自己的阅读方式并没有足够的自觉意识，以至于

^① Jane Gallop, *Reading Lacan*, p. 129.

^② Ibid., p. 128.

时常陷入一种想象性的幻觉，以为只有自己的阅读是正确的，以为自己读到的恰是拉康想说的。理论上说，对于任何一个文本，都只存在多种可能的阅读，而不存在“最终的”阅读，拉康的文本尤其如此。因而在现实中，我们看到的已完成的阅读总是有限的——不只是数量的“有限”，更是阅读视界的“有限”——对于像拉康这种具有“可写性”的作者而言，阅读的有限性乃是其文本存在的一个宿命，因为每一个新的阅读不仅要以已有的有限阅读作为基本的前视域，而且其本身最终必定要成为有限性的一部分，它充其量只是已有的有限性的一个增补。

具体地说，在英语世界已有的拉康阅读中，下面几种阅读方式最为常见。^①

第一，文本化的阅读。

这一阅读直接面对拉康的一个或多个具体文本，或是对其进行注解和导读，或是参照相关文本来梳理拉康的问题与论述逻辑，总体上，这种文本细读是英语世界面对“经典”经常采用的一种方法。对于初学者，这种阅读可为其进入拉康的世界提供诸多便利，但决不能用它来完全取代自己的阅读，那样的话，其作为“导读”的存在价值相当于被取消了。

拉康还在世的时候，对他的阅读就已经开始了，比如安东尼·威尔登（Anthony Wilden）的《自我的语言：精神分析学中语言的功能》（1968年）^②。这大约是英语世界第一本有关拉康的专著，其所讨论的文本是俗称《罗马报告》的《言语和语言在精神分析学中的功能和范围》（1953年），作者不仅提供了该报告的完整英译，还为它做了极为详尽的注释，而且写了一篇十余万字的评述文字，对拉康的思想及其理论源头进行了系统的梳理。当然，这个梳理是简约化的和不充分的，因为作者当时所能参照到的拉康的文本主要是《文集》（1966年）及一些论

^① 需要说明的是，在下面的梳理中，第一，我只限于英语文献——但作者不一定都来自英语世界；第二，我的梳理不包括发表在各类杂志上的单篇论文，因为它们的数量太过庞大，主题也太过分散；第三，我在每一个类型下列举了一些例子，但它们只是“例子”，并不代表该类型的研究的全貌；第四，有一些研究者或研究成果可同时归属于不同的类型，所以他们/它们在分类中的位置不是单一的。

^② Anthony Wilden, *The Language of the Self: The Function of Language in Psychoanalysis*,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68.

文，“研讨班报告”基本参照的是拉康的学生整理发表的提要。以今天的角度看，威尔登的阅读太过粗略，更多地只具有一种历史文献的价值。

再如约翰·缪勒（John Muller）和威廉·理查森（Willian Richardson）的《拉康与语言：〈文集〉导读》（1982年）^①。这个导读依据的文本是阿兰·谢里丹（Alan Sheridan）于1977年翻译出版的拉康《选集》^②。两位作者先是概述每篇论文的基本背景和思路，然后为其提供一个提纲式的结构分解，最后是简要的注释。严格地说，这个“导读”有点名不符实，因为作者基本上只提供了每篇论文的骨架，对拉康具体的论证环节缺乏足够的解析，并且整个导读缺乏整体感，其对文本结构的分解不仅无助于我们的理解，反而会把文本的意义生成简约为一个线性的逻辑展开，拉康理论的拓扑学意蕴丧失殆尽。一句话，作为“导读”的功能，这个本子很难胜任。

1988年，约翰·缪勒和威廉·理查森还编辑出版了《被窃的坡：拉康、德里达与精神分析阅读》^③。这是一本类似于汇编的论文集，两位编者以拉康有关爱伦·坡的小说《被窃的信》的研讨班报告为对象，不仅提供了该报告的译文、概述、文本结构和注释，还收录了包括德里达在内的众多理论家和批评家对拉康的报告及精神分析批评的回应与评论。其实，两位编者的意图是想以《被窃的信》作为案例，来讨论精神分析学与文学批评的关系，讨论精神分析学作为一种阅读与批评技术的意义和价值。可问题在于，拉康对《被窃的信》的“研讨”并非一般意义上的精神分析“批评”，至少拉康自己的意图首先不在于如何将精神分析学运用于文学批评，而在于讨论主体位置的确立与能指的位移的关

^① John Muller and Willian Richardson, *Lacan and Language: A Reader's Guide to Écrits*, New York: International Universities Press, 1982.

^② Jacques Lacan, *Écrits: A Selection*, trans. Alan Sheridan, London: Tavistock, 1977. 后来，布鲁斯·芬克还出版了一个全新的选集译本，其篇目与谢里丹的版本完全相同：Jacques Lacan, *Écrits: A Selection*, trans. Bruce Fink, New York and London: W. W. Norton & Company, 2002。一直到2006年，英语世界才有了《文集》的全译本，译者依然是布鲁斯·芬克：Jacques Lacan, *Écrits*, trans. Bruce Fink, New York: W. W. Norton & Company, 2006。

^③ John Muller and Willian Richardson (eds.), *The Purloined Poe: Lacan, Derrida and Psychoanalytic Reading*,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88.

系，用他自己的话说，他所关注的是能指的“重复”如何决定了主体的命运。总之，拉康只是“盗用”了“字符”（letter）的运作即“信”（letter）的多次“被窃”来对相关主体的命运进行症状式的阅读，在此，文学文本就如同一个梦文本，其关键的要素并非它所谓的“文学性”，而是结构文本叙事的那些无意识场景以及能指在场景中的运作。所以，即便我们认为在拉康那里存在一种文学阅读和文学批评，那也不能把它理解为精神分析学在文学批评中的运用，因为他的阅读和批评是以文学文本的精神分析化作为前提的。

顺便做一个说明。拉康在研讨班中阅读过许多文学文本，除爱伦·坡的《被窃的信》以外，除在许多地方对雨果、瓦雷里、马拉美、兰波这类诗人的诗歌短句一带而过的讨论以外，他还集中阅读了大量作家的作品，如索福克勒斯的《俄狄浦斯王》和《安提戈涅》；中世纪的骑士文学；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法国淫秽作家萨德（Marquis de Sade, 1740—1814）的小说；爱尔兰作家詹姆斯·乔伊斯（James Joyce, 1882—1941）的《为芬内根的守灵》（1939年）；法国剧作家保罗·克罗岱尔（Paul Claudel, 1868—1955）的历史三部剧《人质》（1911年）、《硬面包》（1918年）和《受辱的父亲》（1916年）；法国女作家玛格丽特·杜拉斯（Marguerite Duras, 1914—1996）的《史坦因的狂喜》（1964年），等等，也许，你还可以把柏拉图的《会饮篇》也包括在内。有关拉康的这些“文学阅读”，英语世界有许多研究性的论文和专著，但大部分都属于“文学批评”的范畴。^①

文本化的阅读一般都集中于具体文本，有一些甚至只针对某个特定文本，或是围绕某一文本来组织拉康的理论。

比如上面提到的让-卢克·南希和菲利普·拉科-拉巴特的《字符篇：对拉康的一种阅读》就是一个典范。1973年这本书刚出版不久，拉康就在研讨班（第20期研讨班）上向听众推荐它，并对两位作者的

^① 有关拉康的文学阅读和文学批评，可参见 Ben Stoltzfus, *Lacan and Literature*, Alba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1996; Jean-Michel Rabaté, *Lacan and the Subject of Literature*, Houndsills: Palgrave, 2001; Ehsan Azari, *Lacan and the Destiny of Literature: Desire, Jouissance and the Sinthome in Shakespeare, Donne, Joyce and Ashbery*, London and New York: Continuum International Publishing Group, 2008.

文本阅读技巧及理论才华颇为赞赏，称他们的文本细读令他十分的满足——虽然他对书中的德里达主义给以了措辞激烈的批评。

再如来自比利时的精神分析学家菲利普·凡·胡特（Philippe Van Haute）的《对抗适应：拉康的主体之“倾覆”》（2002年）^① 和来自阿根廷的精神分析学家阿尔弗雷多·艾德尔斯斯坦因（Alfredo Eidelsztein）的《欲望图：对雅克·拉康的著作的运用》（2009年）^②。这两本书阅读的是拉康的同一篇论文，即《在弗洛伊德的无意识中主体的倾覆和欲望的辩证法》（下文简称《主体的倾覆和欲望的辩证法》，个别地方仍用全称）（1960年）。之所以选择这个文本，按照胡特的解释——艾德尔斯斯坦因其实在持相同的观点——就因为它在拉康思想发展的进程中居有纽结性的地位，即它一方面是拉康对自己此前的思想的一个总结，另一方面也是对接下来几年的研究主题的一个纲领性提示。虽然读的是同一个文本，且都是以四个欲望图作为基本研究对象，但两位作者的阐释路径大不相同：胡特的阅读是以主体的无意识构成作为锚定之地，从欲望、幻象、认同和原乐等方面展开对欲望图的论述，而艾德尔斯斯坦因的阅读是以四个欲望图的问题为线索，在每个问题的语境中来逐一解释四个图的结构。两种阅读各有所长，为我们理解拉康的这个文本提供了很好的导引。

还有布鲁斯·芬克（Bruce Fink）的《一字一句读拉康：〈文集〉细读》（2004年）^③。芬克是《文集》完整本及第20期研讨班《再来一次》的英译者——他的翻译的一个重要贡献就是给原始文本添加了极其充分的注释——也是一个拉康派的精神分析学家，这一双重身份使得他的阅读充满一种专注于细节的力量。与拉康的女婿雅克-阿兰·米勒（Jacques-Alain Miller）的阐释性阅读不同，芬克的阅读更加追求“客观”和“忠实”。在《一字一句读拉康》中，芬克集中阅读了拉康《文集》中的三篇论文（同时还讨论了拉康对自我心理学的批判以及拉康在晚期研讨班中对“知识与原乐”的论述），他的阅读简洁、清晰、重点

^① Philippe Van Haute, *Against Adaptation: Lacan's "Subversion" of the Subject*, trans. Paul Crowe and Miranda Vankerk, New York: Other Press, 2002.

^② Alfredo Eidelsztein, *The Graph of Desire: Using the Work of Jacques Lacan*, trans. Florencia F. C. Shanahan, London: Karnac Books Ltd, 2009.

^③ Bruce Fink, *Lacan to the Letter: Reading "Ecrits" Closely*.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2004.

突出，尤其对拉康文本中的逻辑疑难投注了极大的热情。

一般地，《文集》是人们阅读拉康文本时的首选，但拉康派似乎对阅读拉康的研讨班更感兴趣，因为相较于《文集》而言，拉康精神分析学的临床问题在他的近30期研讨班中有更为充分的阐述。在英语世界，我们目前至少可以看到有关第1、2、7、10、11、17、20期研讨班的专题阅读^①，它们有些是论文集的形式，有些是专著的形式，但作者大都以拉康派分析家为主。这些阅读有的重在概念的说明或文本逻辑的梳理，有的重在临床经验或应用，但文章的质量参差不齐，真正有价值的东西不是很多。

第二，阐释性的阅读。

我所谓的“文本化”阅读和“阐释性”阅读并非截然对立的二分：实际上，任何一种文本阅读必定离不开阐释，而任何一种阐释也必定以文本阅读作为前提。我对两者的区分只是针对各自的侧重面而言：“文本化”的阅读主要面对具体的文本，重在梳理文本本身的概念和逻辑，有点就事论事的味道，所以阅读者的阐释是隐藏在“客观”表述之中的；相比之下，“阐释性”的阅读主要是面对拉康的理论问题，重在以问题来梳理拉康的思想，所以阅读者的问题框架主导着其对文本总体的阐释角度。一般而论，这两种方式各有利弊，本来应当相互补充，但具体到研究过程中，拉康文本的特殊性常常使人们很难做到两种方式的协调运作：或则因为过于关注具体文本的细节而使得阅读缺乏整体感和连贯性，或则因为过于追求体系化而导致阅读的简约化。例如注重具体文本的凡·胡特在《对抗适应：拉康的主体之“倾覆”》（2002年）一书

^① Richard Feldstein, Bruce Fink and Maire Jaanus (eds.), *Reading Seminars I and II : Lacan's Return to Freud*, Alba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1996; Marc De Kesel, *Eros and Ethics : Reading Jacques Lacan's Seminar VII*, trans. Sigi Jöttkandt, Albany: SUNY Press, 2009; Roberto Harari, *Lacan's Seminar on "Anxiety": An Introduction*, New York: Other Press, 2001; Richard Feldstein, Bruce Fink and Maire Jaanus (eds.), *Reading Seminar XI : Lacan's Four Fundamental Concepts of Psychoanalysis*, Alba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1995; Roberto Harari, *Lacan's Four Fundamental Concepts of Psychoanalysis : An Introduction*, trans. Judith Filc, New York: Other Press, 2004; Justin Clemens and Russell Grigg (eds.), *Reflections on Seminar XVII : Jacques Lacan and the Other Side of Psychoanalysis*, Durham and London: Duke University Press, 2006; Suzanne Barnard and Bruce Fink (eds.), *Reading Seminar XX : Lacan's Major Work on Love, Knowledge, and Feminine Sexuality*, Alba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2002.

的“卷首语”中就曾提到对拉康文本的两种阅读方式——与我的区分刚好部分地对应——并对那种体系化的阅读提出了批评：

想要为拉康的作品提供导读的作者们必定要面对一个困难的选择：或是用一个一般性导论来处理拉康的所有作品，或是集中于一个或多个纲领性的文本，尝试为其提供一个详尽的评注。我们已经有多个属于第一种类型的导论文字。它们的总论性即是其力量所在，但也是其弱点所在。它们为拉康的全部作品（以及里面所发生的必然发展）提供了一个概览，但恰恰因为这一点，它们有一种对构成作品总体的具体文本进行抽象的倾向。这一程序会产生出双重的后果：在第一种情形中，它可能会过于轻率地做出结论，认为拉康的精神分析学有一个封闭的、人们只能或是接受或是拒绝的体系；在第二种情形中——且可能是更为重要的——它会无意间强化许多人都有的一个印象，即拉康的文本是不可理解的。确实，这些文本因为过于艰涩和含混而颇受诟病，并且，若是没有一个指南性的评注，拉康的许多文本也确实难以理解。然而，如果说一般性的导论几乎不能够或根本不能够涵盖扩展性的文本分析，那它们对于阅读拉康的作品本身通常会毫无裨益。这样，读者总会产生不满，因为不论读多少导论，拉康的文本对于他们仍是不可理解的，并且他们会由此得出结论说，拉康的作品肯定是讳莫如深。如果我们想把拉康从这种争议中解救出来，导论和评注无疑就必须更多地关注具体文本，关注如何使它们变得更容易理解。^①

阐释性的阅读也有很多种，其中以语境化和主题化的阅读最为常见。

语境化的阅读重在于一定语境中来考察拉康思想的发生与发展，其中理论语境是拉康研究中的一大难题，因为拉康自己挪用他人理论的风格是非语境化的，他从不考虑所挪用的概念或思想在原初文本中是如何运用的，而是完全按照自己的理解以一种跳接的方式将其嵌入自己的逻辑中，这使得我们对他的理论语境的阅读和阐释必将面临诸多陷阱。

^① Philippe Van Haute, *Against Adaptation: Lacan's "Subversion" of the Subject*, "Foreword", pp. XI–XII.

比如大卫·梅西（David Macey）的《语境中的拉康》（1988年）^①就着重梳理了拉康与黑格尔或科耶夫、弗洛伊德、索绪尔、雅各布森、列维-斯特劳斯等人之间的关系，是目前我们见到的英语世界对拉康的理论语境做的最为系统的考察。但由于缺乏对拉康文本的具体阅读，也缺乏对拉康挪用他人资源的策略的分析，所以作者提供给我们的语境时常是大而无当，无法加深我们对拉康的理解。

与大卫·梅西的做法不同，理查德·博斯比（Richard Boothby）喜欢用弗洛伊德的一个概念或论题来梳理拉康思想的某个方面，让我们既能从一个侧面看到拉康与弗洛伊德之间的渊源关系，也能对拉康的某一理论本身获得一个相对系统的认识。比如他的《哲学家弗洛伊德：拉康之后的元心理学》（2001年）^②就属于这种典型的语境化研究。在这本书中，作者以弗洛伊德的元心理学作为基本论题，讨论了拉康在这一论题上对弗洛伊德及其精神分析学实施的“激进重述”，以作者自己的话说，他是要在元心理学的理论语境中来“澄清”拉康思想的某些关键方面，并“勾勒”这些方面与弗洛伊德的关系。一定程度上说，博斯比的工作完成得十分出色，通过他的梳理，我们不仅可以看到拉康的某些理论的隐秘源头，而且可以看到经过重新阐释的弗洛伊德及其元心理学的另一种图像。

当然，对拉康的语境化研究应当是多方面的，除梅西和博斯比所关注的那种理论语境以外，至少还有社会文化语境也值得我们重视。在这个方面，同样有人投入了很大的热情。比如拉康的女弟子伊丽莎白·鲁迪奈斯科（Elisabeth Roudinesco）的鸿篇巨制《百年大战：法国精神分析学史》的第二卷《雅克·拉康集团：法国精神分析学史，1925—1985》（1986年）^③——第一卷出版于1982年，以弗洛伊德为主角讲述了1885—1939年的精神分析运动史——就以拉康为主角讲述了法国精神分析运动及拉康学派产生和发展的历史，其中对拉康与国际精神分析

^① David Macey, *Lacan in Contexts*, London: Verso, 1988.

^② Richard Boothby, *Freud as Philosopher: Metapsychology After Lacan*, New York and London: Routledge, 2001.

^③ Elisabeth Roudinesco, *Jacques Lacan & Co.: A History of Psychoanalysis in France 1925—1985*, trans. Jeffrey Mehlman,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0.